

从《王彦超传》看名将形象

◆朝花夕拾 张斌

◆文化漫谈 潘江涛

泥土里的星光

细读《王彦超传》(2026年1月,中国华侨出版社),心中生发一个疑问:在群星璀璨的义乌名人谱里,王彦超有没有一席之地?
书架上有一册《义乌名士文化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),从头至尾找不到王彦超的名字。再翻阅《浙江文史记忆·义乌卷》,还是没有涉及王彦超的片言只字。

暗自思忖,此乃正常现象。因为王彦超虽是五代至宋初的四朝名将,却并非土生土长的义乌人。至于他为何会选择义乌作为“最后的家园”,有一篇网文从人文、地理和环境三方面给出理由,还是颇具见地的。

我给此书作者王光助发去微信,问他网文作者“麒麟舞”是不是他的笔名,收到的回复是否定的。他说,这篇网文“尽赞王彦超的智慧和才能”,他是“非常同意的”,“但在叙述史实方面尚不够严实”。譬如,黄巢起义是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,其时王彦超尚未出生,网文却说他是“一个见过唐末黄巢起义的沙场宿将”,显然与史实不符。

这一网文还写道,“王彦超是在开封去世的”“他生前最后的请求,是将自己葬回一个地方——婺州义乌县明义乡玉门岗”。倘若网文说得没错,那么王彦超对义乌的地理环境是相当熟悉的,至少下葬之地“玉门岗”是他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。可是,事实呢?

《宋史·列传·王彦超》只写到王彦超的功绩、为人,并无“卒于开封”之记载。所以,我更认可王彦超后裔、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国益的文字:“公元983年,王彦超毅然放弃京都的优裕生活,辞别昔日的僚朋,放下人生的羁绊,携其眷属,风尘仆仆踏上了南迁之途。一家人经绍兴到义乌,选择在尚阳王村落脚。后人又迁居至五指山麓的前川村。”(《前川梦吟》,载2015年6月19日《浙江日报》)

从落脚到离世,王彦超布衣粗食,晴耕雨读,已在义乌“前川”遁隐了3年。换言之,“前川”是个地名,但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一个地理名称,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概念。

王光助生于斯长于斯,对先祖王彦超的认知与宗亲王国益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不同的是,王光助推出的《王彦超传》是长篇历史小说——从“名将出生”起笔,到“名将逝世”收尾,42章21万字,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,比王国益的散文《前川梦吟》有更多的转圜空间:“雍熙元年(公元984年),王彦超率全家从会稽徙居婺之义乌赤岸折桂里水月塘旁王村……公元986年初,王彦超寒热数天,退热后仍咳嗽不

止……次日是清明大节……爷魂归西方……安祥睡去如回家一样。”“金华府刺史见报,急写奏章八百里加急送予宋太宗。宋太宗见报异常哀伤……命金华府衙代朝廷前去吊唁抚慰。”

王彦超之墓建在王村中轴线上,是王彦超生前依据地形地貌设计的——从南向北,凤林山、水月塘、水月祠依次排列,不铺张却规整:“墓占地半亩许,正面朝西,墓丈余见方,墓面两侧各有石柱一根,中为墓碑,上书‘郇国公王彦超墓’。”

汪曾祺说:写小说,写的是回忆。

王彦超呱呱坠地时,是中国历史最混乱的年代之一:五代更迭,十国割据,今日的节度使,明日就可能身首异处。而王彦超亲身经历了这一切——12岁从军,跟随后唐魏王李继业征蜀,目睹主帅在政治斗争中遇害;侍奉过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,见识过“儿皇帝”的屈辱;在后周郭威、柴荣麾下屡立功绩,参与过决定中原命运的高平之战。

掩卷而思,《王彦超传》以史为纲,以典型人物、事件、场景及其历史关系的讲述为中心,用心讲述五代至宋初的历史故事,构成作者王光助在这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行文方式,颇有古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。

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,是传记创作最本质的特征,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任何虚构都是不允许的。王光助在创作《王彦超传》中严格遵循传记写作的底线,即一切以史实为基准,历史、人物及其关系不能虚构,更不会篡改。在此前提下,他又特别青睐讲故事的方式方法,对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归集或叙述。

譬如,“杯酒释兵权”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,折射出王彦超“深谙进退,明哲保身”的生存智慧。倘若不读原文,许多读者和我一样,往往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因为“杯酒释兵权”并非一次性完成,而是先内后外分两步进行的:第一次是公元961年,针对禁军将领,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石守信、高怀德等高级将领饮酒,以委婉方式劝其交出兵权,顺利解除中央禁军的威胁;第二次是公元969年,赵匡胤故技重施,宴请王彦超、武行德等手握重兵的地方节度使,劝其退休养老,从而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。在演绎这一历史典故时,王光助讲究铺垫、节奏、层次,努力做到脉络清晰而又不失故事性。同时,作者注重对情调、场景氛围的渲染或营构,完美凸显王彦超审时度势、急流勇退的“智者”形象。(《杯酒释兵权》)

又譬如,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

奔王彦超,却被王拒之门外。称帝之后,以“宽仁”自居的赵匡胤竟旧事重提,所幸王彦超听出了弦外之音,急中生智,降级顿首曰:“勺水岂能止神龙耶!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,盖天使然尔。”在《立家规,三代隐居不扬名》中,王光助对这几句话开展了谨慎而有限度的想象——有渲染,有细描,有特写。如此叙述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场景,但又是合乎情理的。

三
书写名人传记,通常被圈内人士称作“走钢丝”——史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。

读作品,也是在读作家。王光助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。看其履历,舞文弄墨并非专长。然而,王光助走起“钢丝”,却是驾轻就熟,亦不逊于某些专业作家。

2022年,74岁的王光助开始文学创作,3年后成功推出一部以浙中山区几对男女青年成长、婚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《新生之路》(2025年6月),出版社给予的评语是:“作品以锐利的洞察力和时代精神内核,以沉静的笔触引发广泛共鸣与沉思,展现了文学穿透人心的力量。”

王光助是王彦超第36代孙,但凡与先祖有关,无论是坊间口耳相传的轶事,还是宗谱上详细记载的文字,他都感兴趣。在他看来,先祖王彦超“在四朝更迭中得以善终,并让家族在义乌开枝散叶,靠的不是运气,而是一套乱世中的生存哲学。”

王彦超是一位有血有肉的“儒将”,既有武将的勇猛与忠诚,又有文臣的仁爱与谦逊;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,又有急流勇退的清醒。或许,王光助正是被这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所折服,才萌发为王彦超写一部传记的意念。而且,因为有了《新生之路》作铺垫,他亦知晓这是一场极富挑战性、极具难度的文学创作活动——从知识储备、史料梳理、篇章构思,到落实到纸面或电脑屏幕的具体写作,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轻松,需要身力和

心力的双重合作、艰辛付出。

在苦等《新生之路》出版的日子里,王光助系统梳理了唐末、五代、宋初的历史文献,摘抄、甄别与王彦超有交集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,详细了解王彦超所处时代的衣食住行、官衙等专业知识。其中,细读的书籍有《二十四史》《新唐书》《五代史》《宋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中国通史》等。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也没有白读的书。书读多了,表达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——王光助“青春焕发”,上午伏案创作3小时,下午再续写2小时,2个月便完成初稿,又花8个月修改、补充和考证。

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。在我看来,王光助勾勒的王彦超形象真实可信:一是无限接近本源性的历史真实,以及有限度地依靠想象和虚构生成的艺术真实,两者交相辉映;二是依靠文献发掘、整理和研究所得来的“文献真实”,无不经对比、核查;三是由亲临其境、田野调查所累积生成的“客观真实”,以作家视野和经验所淬炼出的“审美真实”,难分彼此。三种“真实”交融互济,让“活化”了的王彦超从故纸堆中走出来,站立在阳光下,接受崇敬与膜拜,功莫大焉。

四

“我写的是名人传记,就要有史学家的诚实。”王光助坦言,“有关王彦超的民间传说,包括宗谱上的记载,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原貌的,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错和矛盾之处。譬如,说王彦超是王彦超的兄弟,王彦超曾任越州节度使等,其实是不存在的。”“把不存在的东西,即便那东西是荣耀和光环,强加给历史人物,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”

历史人物是复杂的,也是多面的。王光助以文学笔触勾勒的王彦超形象,是否客观逼真,读者自会评说。令人感佩的是,王光助以古稀之年敲击键盘,尝试写作,无疑是一次艰苦的精神寻根,是特别值得言说的。



石城藏忠魂

◆随行漫记 潘爱娟

暮春的,裹着东海特有的湿润,轻轻漫过临海桃渚古城的石墙。我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,脚步放得极轻,生怕惊扰了沉睡在石缝里四百多年的忠魂。作为一名义乌人,来桃渚,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,而是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定,一场与戚家军义乌兵的深情邂逅。

桃渚城,又名桃城,三面枕山,东面临海,地势险要,是明代专为抗倭而建的千户所城,也是戚继光在台州抗倭的重要战场,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古城的城墙全由乱石千砌而成,没有刻意打磨的规整,每一块石头都带着天然的棱角,恰似当年义乌兵们不屈的脊梁,透着军事堡垒独有的刚毅。

城门还在,只是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威严,两块破旧的门板孤零零地靠在石墙上,木纹里嵌着岁月的尘埃,默默诉说着无尽的沧桑。我抬起手,指尖抚过冰凉的石墙,凹凸不平的触感里,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硝烟,能触到义乌兵们手握兵器的温度。望着这扇沉默的城门,我的思绪悄然穿越了时空,撞进了那个倭患频仍、民不聊生的年代。

明嘉靖年间,台州沿海三五百里皆为倭穴,而桃渚作为门户,更是首当其冲。正统四年(1439年),倭寇曾血洗桃渚,“积骸如陵,流血成川”,即便隔着五百多年的时光,依旧让人不寒而栗。直到嘉靖三十八年(1559

年),戚继光亲赴义乌,招募了四干义乌子弟兵,组建戚家军,踏上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,才为这里的百姓带来了生的希望。义乌人的骨子里藏着一股坚韧不拔、敢打敢拼的韧劲。他们是一群耕耘劳作的农民,没有正规的军事训练,却有着最纯粹的家国情怀,不懂兵法谋略,却有着守护家园的坚定信念。

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,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,两旁老屋错落有致,白墙黑瓦间透着江南水乡的韵味,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,见我驻足,便笑着说起当年戚家军义乌兵的故事。“听说那些义乌兵,个子高,嗓门大,说话我们听不太懂,可心眼好。”白发苍苍的老人眉眼间满是敬佩,“我祖辈说,当年他们来的时候,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,还带着他们耕地、修房子。”这些朴实的话语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那段被时光尘封的记忆。

顺着老人指的方向,我登上了后所山的山顶。两座残存的空心敌台静静地矗立在那里,青砖黛瓦,虽历经风雨侵蚀,却依旧挺拔。这是戚继光在桃渚抗倭的见证,也是义乌兵们用双手筑起的防御屏障。不同于寻常的警楼,这两座敌台采用长方形石砌筑,台中空,分为两层,上层可瞭望敌情,下层可驻扎士兵、存放粮草器械。站在敌台上远眺,东海的碧波尽收眼底,远处的烽火台清晰可见,恍惚间,我似乎看到了当年义乌兵们日夜值守的身影。

后所山的碑亭里,存放着《桃渚新建敌台碑记》的残片,碑文虽已漫漶,却依旧能辨认出“参府戚公”等字样,无声地诉说着戚继光与义乌兵们的抗倭功绩。我俯身细细品读,耳边似乎响起了当年义乌兵们挥汗如雨修筑敌台的声响,眼前浮现出他们疲惫却坚定的脸庞。

站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,我闭上双眼,厮杀声、呐喊声仿佛穿透时空而来。义乌兵们手持狼筈、长枪,呐喊着冲向倭寇。他们摆出鸳鸯阵,配合默契,一人持盾防御,一人持狼筈打乱敌阵,长枪手趁机刺杀,弓箭手远处掩护。有记载说,一名义乌士兵被倭刀砍中手臂,却依旧死死握住狼筈,奋力斩杀倭寇,最终倒在了战场上。这样的故事,在义乌兵中还有很多,他们用鲜血和生命,诠释了“忠勇”二字的真正含义。

战役结束后,桃渚城得以保全,百姓们捧着自家酿的米酒、热气腾腾的饭菜,迎接凯旋的义乌兵,那份军民同心的情谊,在战火中愈发深厚。如今,在古城的博物馆里,还陈列着当年义乌兵使用过的狼筈、长枪,还有他们后来北上修筑长城的砖块——那些幸运的义乌兵,后来奉命北上,用守护桃渚的忠勇,去守护万里长城,将义乌人的坚韧与忠诚,刻在了更大的疆场上。

漫步在古城的街巷,每一步都踩着历史的痕迹。城西的石墙边,一块残存的城砖上刻着模糊的铭文,据说是当年义乌兵们烧制的;巷口的老井,相

传曾为义乌兵们提供过饮用水;就连路边的野草,都似还残留着当年的硝烟气息。我走走停停,触摸着一处处与义乌兵相关的遗迹,心中满是感慨——这些来自义乌的子弟,远离家乡,告别亲人,用青春与热血,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,他们的忠勇之气,永远留在了桃渚的土地上。

返程的时刻临近,我缓缓走下城墙,回望那两座矗立的敌台,回望这片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,心中百感交集。四百多年的时光,倭患早已成为历史,那些浴血奋战的义乌兵们,也早已化作石城之下的一抔黄土,但他们的英雄事迹,被桃渚百姓代代相传,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作为一名义乌的文艺工作者,我常常在想,我们应该如何铭记这段历史,如何传承这份忠勇精神。或许,是像桃渚百姓那样,将这些故事代代相传,让英雄的事迹永不褪色;或许,是常走上这片英雄的土地,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忠诚与热爱,汲取前行的力量;或许,就是用文字,记录下这些英雄的事迹,让更多的人知道,在四百多年前,有一群义乌兵,在台州桃渚,用热血与生命,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。

离开桃渚古城,我还是那样的依依不舍。我知道,我带走的,不仅仅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,更是对戚家军义乌兵的敬仰与缅怀。

再见,桃渚古城。我想,我一定会再来。

◆汉诗节拍 朱中宝

桥头古樟

茫茫天水汇江龙,处处津梁欲赛虹。
车马驰驱王过,东西往返南北通。
扁舟几叶蒲帆远,素练一条明月朦。
风雨百年谁见证,桥头巨木势豪雄。



图图